

从地图和纪行史料看清朝对哈萨克的早期认识

[哈]巴哈提·依加汉(Bakhyt Ezhenkhan-uli)

本文在对几份清代地图及纪行中有关哈萨克的记载进行讨论的基础上,就清朝对哈萨克的认识过程、某些史料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个别具体史事的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第一,现有的史料虽然有一些模糊的记载,但还无法使我们确认明末清初哈萨克与明、清政权交往的事实;第二,南怀仁《坤輿全图》中的“加撒基”是我们所知 Qazaq 一名最早的汉文译写形式;第三,图理琛《异域录》地图中的“哈萨克乃古大宛国”的说法来自康熙皇帝,尽管是一个错误的概念,但它的缘起及有关天马的故事反映了清朝对哈萨克重视的开始,它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此后清朝有关“西域”历史的话语建构提供了思维路径;第四,《雍正十排图》中有关哈萨克的记载对《乾隆十三排图》相关内容具有重要影响,这一影响的范围和意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予以重视;第五,《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和《从军杂记》中的有关记载反映了 1727 年至 1732 年哈萨克与准噶尔势力此消彼长的形势。

关键词:清朝 地图 纪行 哈萨克 准噶尔

作者巴哈提·依加汉,哈萨克斯坦国立 L. N. 古米廖夫欧亚大学教授。地址: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邮编 010000。

一、明末清初的哈萨克

1757 年秋,中玉兹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使清廷并致书乾隆皇帝。在这一被清朝称为“表文”的信件中写有这样的语句:“自我祖额什木汗及江吉尔汗以降,吾等未得额真之眷顾矣。”^①阿

^① 阿布赉这一“表文”流传后世的原只有其汉文本。近年来,随着满文清档的发布,这一文件的其他两种版本即一托忒文抄件和一满文翻译件也得以见诸于世。比较三种版本可知:迄今仍被广泛引用的汉文本乃是为适应清廷所需而制成的“历史文献”,阿布赉原信中朴素的示好话语在此已被改头换面。参见巴哈提·依加汉:《历史与传说——阿布赉汗致中国皇帝乾隆的首份信及相关问题》(俄文),《事务周刊》2010 年第 3 月第 11 号(总第 899 号);巴哈提·依加汉:《阿布赉汗致清廷的首份信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问题》(哈萨克文),《哈萨克共和国科学院通讯》2010 年第 2 期。此处所引文字乃据阿布赉信之托忒文及满文版本翻译。该信之托忒文抄件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号为 1643-008 (045-002679)之兆惠奏折附件;满文翻译件见邢永福主编,邹爱莲、巴哈提·依加汉副主编:《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 2 册,档案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5 页,附件 2。另,中文版中哈萨克两汗之一被称作“杨吉尔”。此处哈萨克汗名当为 Jāngīr 无疑。“杨”字或是因原名首音“j”被误读作“y”所致。鉴于此,我把此名改译为“江吉尔”。

布賚的这些话自然不是无的放矢。结合此后哈萨克使臣在觐见乾隆皇帝时提出的要求^①和所述两汗时期哈萨克的遭遇,^②可知阿布賚此处除了示好清廷以便为己获取政治利益之外,也在为其部众争取重返故地的权利。同时,这一说辞似亦暗示:至迟在额什木汗及江吉尔汗时代(额什木汗统治时间为1598-1628年,江吉尔汗统治时间为1643-1652年),哈萨克与明、清王朝之间有过某种交往或联系。那么,这一交往或联系在史料中有无反映呢?据我们所知,与所述哈萨克两汗时代相近的汉文史籍中不见哈萨克一名的踪迹。然而,其中也不乏令人遐想的模糊内容。

众所周知,永乐时期明朝与中亚帖木儿后裔统治的“地面”有过比较紧密的来往。直至天启七年(1627)为止的明朝文献中也一直有西域来贡的记载。^③尽管明朝有人指出某些所谓的“西夷诸地使臣”乃是吐鲁番等处的商人冒为,^④但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东赴明朝的“西夷”当然不全是吐鲁番商人。遗憾的是,因明人在记述中亚时多以城名指称某一政权或“地面”,^⑤所以明代史料中的许多类似专名迄今为止并未能被确认所指为何。^⑥《殊域周咨录》一书有嘉靖十一年(1532)“额^⑦即乱国遣使扣关求贡”的记载,并称:“今据行都司会审夷使火者皮列等供称,哈辛王等原在撒马尔罕北山额即乱地面居住,且言半是达子。”^⑧近年有研究者试图将“哈辛”一名强译为“哈萨克”,^⑨但从此处史料文意即可知“哈辛”乃是人名无疑。诚然,明代史籍所称“额即乱”乃来自“Özbek”(月即别,今译“乌兹别克”)一名,而十五世纪前半叶在原金帐汗国的东面部分有游牧人称己为“Shaibani-Özbek”(昔班尼月即别)或“Özbek-Qazaq”(月即别哈萨克)的。但嘉靖年间的“Özbek”(月即别)似已与哈萨克无涉。其所指应是与哈萨克分离且已南移的所谓“游牧月即别人”。

值得注意的是,哈萨克汗国自其建立伊始便与东邻明朝的东察哈台汗国亦即明朝文献中的“别十八里国”建立了密切关系。历哈斯木、塔希尔及哈克纳扎尔三任汗,及至1580年,七河地区尽为哈萨克所据。据此后的穆斯林记述,哈萨克图尔孙汗与统治喀什噶尔及叶尔羌的阿布都·拉提夫(Abd al-Latif)汗,^⑩以及随后哈萨克额什木汗与统治察力失及吐鲁番的阿都刺因(Abd al-Rahim)汗都有过姻亲结盟关系。在哈萨克汗国发展过程当中,原属东察哈台汗国

① 《清高宗实录》卷548,乾隆二十二年十月甲子条所载乾隆“敕书”中有“至尔来使奏称,塔尔巴哈台原系尔等旧游牧,恳恩赏给”之语(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9-10页)。相同的记述亦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中,见:《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档案号1855-022(缩微号01394-01406)。

② 正是在此二汗时期,准噶尔对哈萨克汗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进攻。

③ 据我们所知,有关这一内容的最晚记载见于《明熹宗实录》卷86,天启七年七月甲申条。其文称:“西夷五地面吐鲁番进贡。”

④ (明)杨一清:《关中奏议》卷12附录《陈九畴疏》,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322页。

⑤ 例如把东察哈台汗国或称作“别十八里”,或称作“亦力把里”。又如把帖木儿后裔统治的国家称作“哈烈”。

⑥ 在《西域土地人物略》中即有几个类似专名。参见陈高华编:《明代哈密吐鲁番资料汇编》,第402页。

⑦ 讹作“颇”。

⑧ 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92页。《明世宗实录》卷135中有关史文写作:“至于额即乱哈辛乃鞑鞑回夷”。

⑨ Nurlan Kenzheahmet, “The Qazaq Khanate as Documented in Ming Dynasty Sources,” *Crossroads*, No. 8, October 2013.

⑩ 据楚拉斯记载,阿布都·拉提夫汗之母哈尼木·帕德莎(Hanim-padishah)乃是哈萨克图尔孙之姊。见 Шах Махмуд Чурас, *Хроника*,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перевод,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и указатели О. Ф. Акимущкина. М., 1976(以下简称《楚拉斯史》俄译本), с. 252。

的部分游牧部众被纳入了哈萨克汗国并对哈萨克民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①据马黑麻·海答尔《拉失德史》,“向阳地”(亦即后代被称“回疆”的地域)在东察哈台汗国时期实际上是控制在朵豁拉惕(Dughlat)游牧部族强人之手的。而哈萨克大帐的都拉惕(Dulat)与此部有直接的渊源关系。^②

现有的史料以及我们对相关史料的把握程度还不足以证明明末清初汉籍中确有关于哈萨克的记述。哈萨克一名在汉文中的出现还在稍后,且与入华天主教传教士的知识传播有直接关系。

二、《坤輿全图》中的“加撒基”: 现知 哈萨克一名的最早汉译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对华传播的域外知识内容涵盖诸多方面,其中亦包括地理知识。1674 年左右制成的南怀仁《坤輿全图》中即出现了比较具体的有关中亚地区地理及地名的记载。图 1 是该图有关中亚北部地区的部分(图中诸地名右方数字标识为本文作者所加)。^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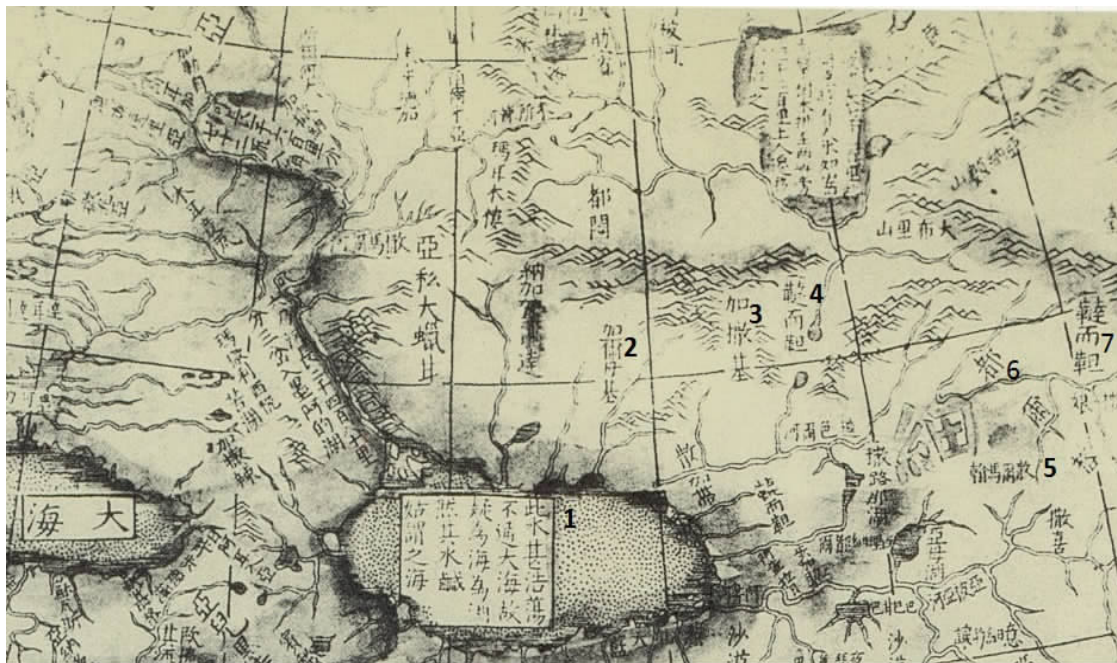


图 1 南怀仁《坤輿全图》(部分)

① В. В. Востров, М. С. Муханов, Родоплеменной состав и расселение казахов. Алма-ата: Наука. 1968, с. 29, сс. 56-60, сс. 67-72; Юдин, П. . О родоплеменном составе могулов Могулистана и Могулии и их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связях с казахскими и другими соседними народами. Известия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захской ССР, се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1965, № 3, с. 59; К. А. Пищулина, Присырдарьинские города и их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казахских ханств в XV-XVIII веках. Алма-ата: Наука. 1969, с. 238; A. J. Frank, *The Qazaqs and Russia*, in Nicola Di Cosmo, Allen J. Frank and Peter B. Gold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65.

② 见上引波斯特洛夫及穆罕诺夫(В. В. Востров, М. С. Муханов)著作。

③ 南怀仁《坤輿全图》有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及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本。本文之图引自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图版第 145。

尽管其记述中有不少模糊甚至讹误之处,但作为最早的世界地图之一,《坤輿全图》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信息。例如,图1下半部分见有一大水域并附有相关释文。释文称:“此水浩荡,不同大海。故疑为海,为湖。然其水咸,姑谓之海。”水域虽讹为南北窄东西长,但从所出位置、汇入河流及其特性的描述可知此乃是里海。而该图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此水域以东以北出现了不少用汉文拟写的部族名及地名,其中亦有我们所标示的“加尔母基”(标号2)、“加撒基”(标号3)及“鞑而鞑”。

“鞑而鞑”应是“鞑靼”亦即 Tatar 或 Tartar 族名的另一写法。细阅此图可见:除我们所标示的第三号专名外,图中仍有几处“鞑而鞑”。例如,在被称作在“都尔格思单”(标号6),亦即 Turkestan(突厥斯坦)地区的东面亦有“鞑而鞑”(标号7)。我们认为,这些不同的“鞑而鞑”所指多为十七世纪后进入七河流域和哈萨克北部的准噶尔蒙古部落。

再来看“加尔母基”(标号2)和“加撒基”(标号3)二名。两种译名中运用了相同的“加”及“基”字。在早期官话(Early Mandarin)体系中,此二字的声母均以“k”音开头。^①而在清代有关外族情形的汉文史料中,“尔”一字既可用之于拟写“r”音,亦可用之于拟写“l”音。根据这些规律,“加尔母基”,“加撒基”二名可分别还原为“Kalmak”和“Kazakh”,现通常汉译作“卡尔梅克”和“哈萨克”。^②

南怀仁《坤輿全图》中的这一记载有其独特的史料学意义。众所周知,自十七世纪末以降,几乎所有的汉文史籍都译 Kazax (Kazakh) 一名译为“哈萨克”。^③因《坤輿全图》的上述记载我们得知:除“哈萨克”这一标准形式外,在清代也有用其他汉字译写该名的情形。而“加撒基”则应被视作是该名为人所知的最早汉字拟写形式。

三、图理琛《异域录》地图中的“哈萨克乃古大宛国”一说:渊源及影响

图理琛《异域录》和该书所附地图对研究十八世纪前期哈萨克历史地理亦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图理琛《异域录》地图所提供的地名在数量上似乎比南怀仁《坤輿全图》还要少,然而,根据《异域录》文字的记载,图理琛等人在行进途中曾在额尔齐斯河流域路经哈萨克与俄罗斯及其他几种部族交界之处,因此其相关内容或来自实地考察,或采录于邻近土著,其准确性要高于后者。

以下是《异域录》地图满汉两种版本有关哈萨克的内容(图中诸地名上方数字标识为本文作者所加)。④我们把相应的两组记述制成了对照表。

① 据蒲立本,此二字的早期官话音值分别为:加 kja; 基 ki。参见 Edwin G. Pulleyblank, *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 UBC Press, 1991, pp. 143, 137。

② 需要指出的是:从“加撒基”一名中的“撒”字来看,此名的读音并非来自哈萨克人或是其他突厥语族之人。该名的来源应与操蒙古语者有关。

③ 关于这一译名,参见[法]伯希和著、耿昇译:《卡尔梅克史评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52页注2。

④ 该图满文本称《Lakcha jecen de takuraha babe ejehe bithei》,汉文本称《异域录舆图》。本文附图据庄吉发:《满汉异域录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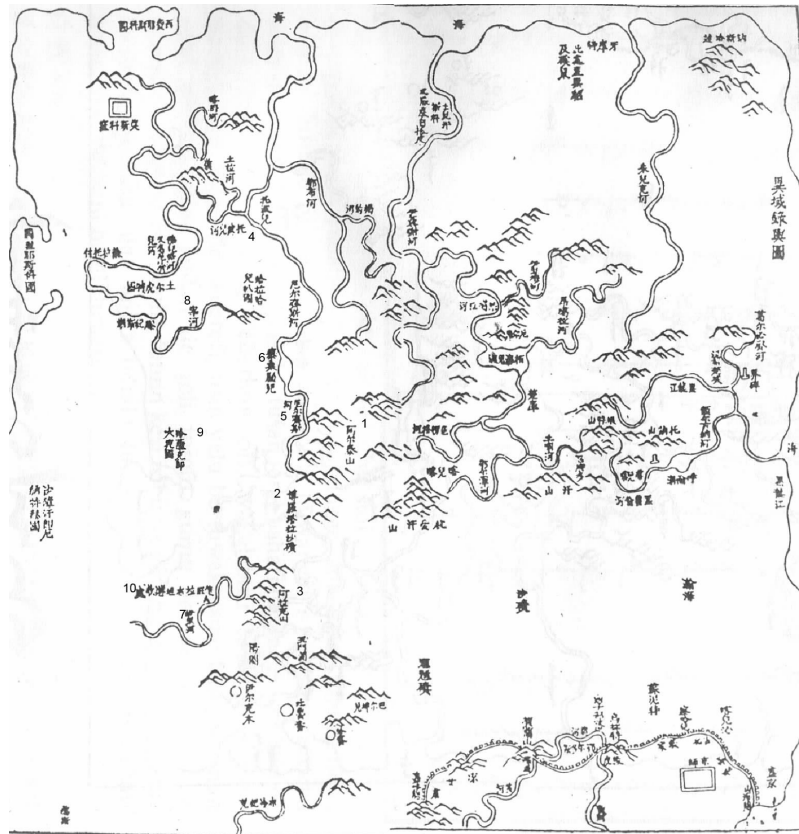


图2 《异域录》舆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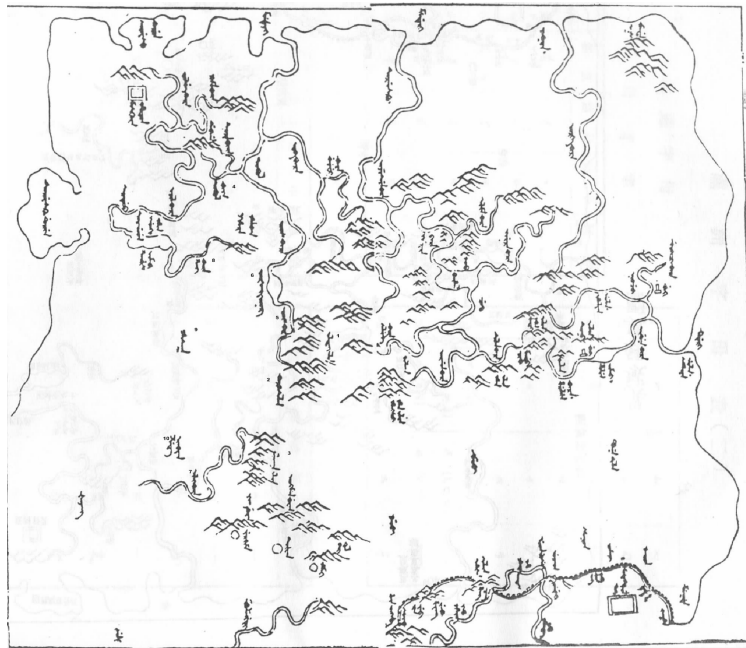


图3 《Ba Na i Nirugan》局部

	汉文本文字内容	满文本文字内容 转写	满文本文字内容 含义	现今汉哈地名
1	阿尔泰山	Altai alin	阿尔泰山	阿勒泰山 (Алтай тауы)
2	博罗塔拉沙磧	Bortala	博罗塔拉	博尔塔拉 (Бортала)
3	阿拉克山	Alak alin	阿拉克山	阿拉套山 (Алагау)
4	托波尔	Tobol bira	托波尔河	托博尔河 (Тобыл өзені)
5	厄尔奇斯河	Ertis bira	厄尔奇斯河	额尔齐斯河 (Ертіс өзені)
6	斋桑脑尔	Jaisang noor	斋桑湖	斋桑湖 (Зайсан көлі)
7	伊犁河	Ili bira	伊犁河	伊犁河 (Іле өзені)
8	宰河	Z'ai bira	宰河	乌拉尔河 (Жайық өзені)
9	哈萨克即大宛国	Hasak	哈萨克	
10	策旺拉木坦游牧处	Ts'ewang Rabtan	策旺拉木坦	

对照《异域录》地图两种文字版本,如下现象首先引起我们的注意:尽管二者均示哈萨克为一广阔地域,但二者记述文字却稍有不同,满文本在涉及哈萨克时仅提及“Hasak”族名,而汉文本则进一步说明:“哈萨克即大宛国”(图中 No. 9 地名)。汉文本中有关哈萨克渊源的这一结论有何依据?两种文本的差异有何意义?

查阅文献可知,“哈萨克即大宛国”一说最早出自康熙皇帝。《平定朔漠方略》记载:

(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丁酉,诸王请安发马迎驾。上骑而行,顾大学士张玉书等曰:“朕所乘马乃系哈萨克国之马,噶尔丹得之。为我军所败,我军得之。朕乘而视之,其汗如血。故所称大宛汗血马想即此也。”张玉书等奏曰:“史称大宛马为天马。其汗赤,行可追风。以为祥瑞,入于乐歌。臣等未见,常谓之虚言。今圣上乘之,观其汗相符。苟非德威远播,何易得此非常之马乎?”^①

这是清廷有关哈萨克的最早讨论之一。从史料本身看,把哈萨克比定为大宛并非出自审慎的考证。其意图则可从张玉书“大宛天马乃祥瑞”的说辞中窥知一二。陷入憧憬中的君臣此刻脑海中浮现的应该是《史记》中有关汉武帝的如下记载:

初,天子发书《易》,云“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②

显然,汉朝与西域诸国建立关系、武帝得天马以“断匈奴右臂”之历史经验乃是促使康熙放眼哈萨克的真实诱因。而后来的历史亦证明:康熙的这一行为的确具有前瞻性。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平准战略和其在新疆的驻防、屯田以及移民等诸项政策的落实无不与哈萨克马相关。

至图理琛,源自康熙的“哈萨克即大宛国”的说法出现在《异域录》地图的汉文本中。那么,《异域录》地图满文本中何以只有国名而无溯源之记述呢?其实,有关差异显然亦与上述“天

^① 《平定朔漠方略》卷34,康熙三十年十二月丁酉,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学文献编辑室编辑:《西藏学汉学文献汇刊》第四辑:《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上下两册),1994年,第13-14页。

^② 《史记》卷123,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3170页。

马”故事有关:在汉地文化概念中,外族“贡马”乃是“九方来朝”的象征。因此,清朝皇帝在此似乎在暗喻自己足可比肩汉武;所得“祥瑞”亦可向汉地证明:自己虽出异族,但帝统却是天所神授。当然,与此相关的宣扬对象也主要是汉地书生而非读满文的旗人。这应是两种版本文字有所差异的直接原因。

“哈萨克即大宛国”的说法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与哈萨克正式建立关系后,乾隆及其朝臣以此为内容书写了不少诗文。但此后的接触加深了清朝对哈萨克的认知。清廷逐渐认识到:汉代的大宛在今费尔干纳地区,跟哈萨克毫无关系。因此,“哈萨克=大宛”的错误判断也渐渐被人们抛弃。但始自康熙的这一思路给清朝的笔吏们提供了观察西域历史的视角及建构有关历史话语的样本。

四、《雍正十排图》中有关哈萨克的记载及其与 《乾隆十三排图》相应内容的关系

浏览《康熙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及《乾隆十三排图》等清代三大地图的有关内容,可清晰地感受到清廷是如何逐步加深中亚地区认知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很少顾及阿尔泰、塔尔巴哈台、博尔塔拉及伊犁河上游以西地区,而1728-1729年左右绘制而成的《雍正十排图》上的情形已大有改观。有关现哈萨克斯坦地域的内容在该图中也增加了许多。但据我们所知,迄今为止有关这些内容的研究并未尽如人意。该图版本稀少、流传不广应该是其原因之一。^①此外,满文史料多年来未受应有重视,这也限制了不少研究者对该图内容,尤其是该图有关中亚哈萨克之内容重要性的认识。2007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三大清代地图以《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之名得以出版,这为有关内容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

根据我们对《雍正十排图》的初步探讨,我们认识到:该图是有关中亚及哈萨克地区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史料。其记述丰富了这一地区历史地理的内容。

相较以前的清代地图,《雍正十排图》涵盖了更广的地域。例如,我们在该图《五排西七》部分除注意到有图理琛《异域录图》满文本中的“Tenggis omo”(汉文本作“腾纪斯湖”,亦即里海)等地名外,也看到有“kiyawa hoton”(希瓦城),“turkumen tehe ba”(意为“土库曼所居之地”)等地名或地名释语。而在《五排西六》部分则见有锡尔河及其邻近地区的一系列地名。

图中也增添了有关哈萨克的更多地名。如前所示,图理琛《异域录图》所载哈萨克地名寥寥无几。同样,《康熙皇舆全览图》亦很少涉及哈萨克地域。而《雍正十排图》之《四排西五》、《四排西六》、《五排西五》及《五排西六》等部分中均出现了十数个甚至二十多个具体地名。

《雍正十排图》的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乾隆十三排图》产生过影响。试以两图有关哈萨克北方地区的记述为例说明之。此地区主要见于《雍正十排图》之“四排西六”和《乾隆十三排图》之“七排西四”部分。

比较两图可发现:《雍正十排图》之“四排西六”部分中的地名在《乾隆十三排图》的相应部分都有。或可认为:此处的相似是因两图形成期间上述地名未变,《乾隆十三排图》信息来源独立于《雍正十排图》。但细究如下内容,我们有理由相信《乾隆十三排图》这一部分的绘制是以

^① 据介绍,该图现有三种版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信息中心藏有有一部刻印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个印本和一个手绘本。参见汪前进、刘若芳编:《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外文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3页。

《雍正十排图》“四排西六”为蓝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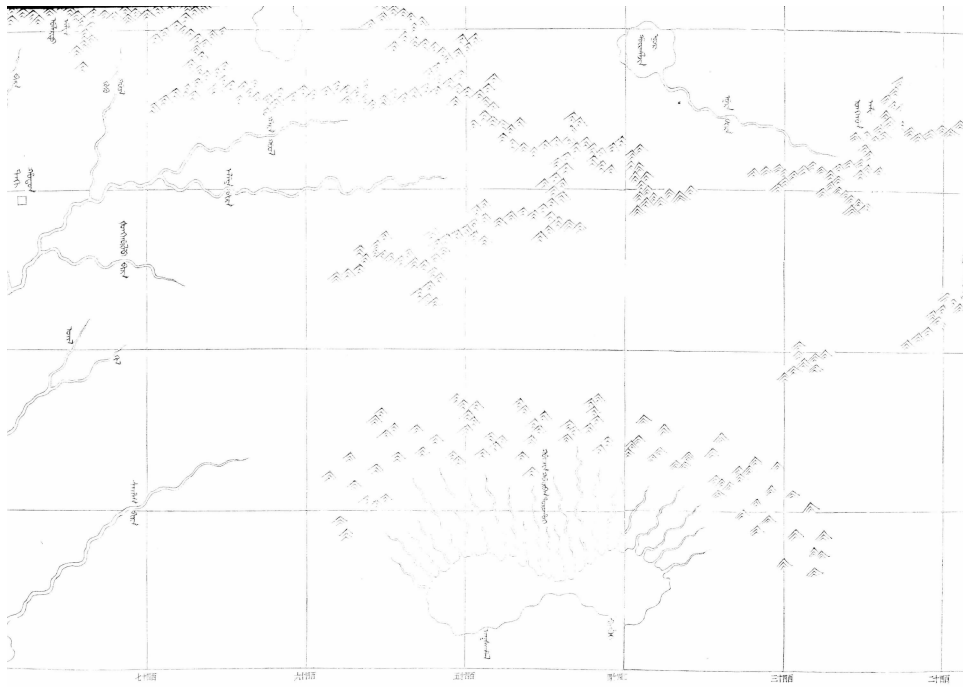


图4 《雍正十排图》之“四排西六”局部。据汪前进、刘若芳编：《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



图5 《乾隆十三排图》局部。据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nF). Ge D 25949 (1) RES

	《雍正十排图》 之“四排西六” 满文地名转写	《乾隆十三排图》 汉文地名对应	当代哈萨克语地名	《雍正十排图》 上所处位置
1	baha nas bira	巴哈纳斯比拉	Бақанас өзені	iii(西40+西41)
2	bayan alin	巴彦阿林	Баянауыл тауы	iv(西40+西41)
3	gūrbān hasuluk alin	古尔班哈苏鲁克阿林	Желдібай, Арғанаты, Ұлытау таулары (?)	vi(西41+西42)
4	esil bira	鄂锡尔必拉	Есіл өзені	ii(西42+西43)
5	sidet ereimen alin	锡德特额垒谟阿林	Еремен тауы	ii(西42+西43)
6	onggon alin	甕衮阿林	Мұзбел	v(642+643)
7	hūrgaljīn nor	胡尔哈金淖尔	Қорғалжын көлі	v(643+644)
8	nura bira	努拉必拉	Нұра өзені	v(西43+西44)
9	gūcīn gūrbān torohoi	古沁古尔班托罗辉	Сары Торғай, Қара Торғай өзен аңғарлары	vii(644+645)
10	hara gool	哈拉郭时尔	Емболат өзені	v(西46+西47)
11	elek bira	额勒克必拉	Елек өзені	v(西46+西47)
12	barbui	巴尔贝	?	viii(西44+西45)
13	ahsahal	阿克萨哈尔	?	viii(西44+西45)
14	ulartu alin	乌拉尔图阿林	Ұларты тауы	iv(西47+西48)
15	kuku gool	库苦郭时尔	Быковка өзені	v(西47+西48)
16	cagan bira	察罕必拉	Шаған өзені	v(西47+西48)
17	taki hotong	塔奇和屯	Теке қаласы	v(西47+西48)
18	šonggorlu bira	顺郭尔鲁必拉	Шыңғырлау өзені	vi(西47+西48)
19	oil	鄂伊尔	Ойыл өзені	vi(西47+西48)
20	kil	奇尔	Қиыл өзені	vii(西47+西48)
21	sahas bira	绥库必拉(或色衣库 必拉)	Сағыз	vii(西47+西48)

首先,《乾隆十三排图》中的这些汉文地名完全是《雍正十排图》满文地名的对应音译,以下事实可以证明之:满文地名中有 bira(河)一词之处在汉文本中亦得尽行拟出(见“巴哈纳斯比拉”“鄂锡尔必拉”“努拉必拉”及“察罕必拉”等河名),而满文本中无此词之河名在汉文本中亦得以照搬(如“鄂伊尔”“奇尔”)。这自然不是巧合。

其次,《雍正十排图》中大而化之的内容在《乾隆十三排图》中也得到了体现。两图所示“Gücin Gürban Torohoi”(古沁古尔班托罗辉)的地理位置是最明显的例子。究其词源,该地

名前半部分“Gücin Gurban”来自蒙古语,意为“三十三”;而现今哈萨克地理概念中,“图尔盖”(“Тургай”,意为“麻雀”)乃是一重要地名。有图尔盖高地,也有大大小小冠以此名的河流(如“图尔盖”,“黑图尔盖”,“黄图尔盖”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河流涵盖的范围包括从现哈萨克斯坦中北部的图尔盖高地和中南部的夏勒哈尔湖这样一个辽阔区域。《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两图中的地名含义当为“三十三条托罗辉河”(图中所绘虽不够三十三之数,但确有多条河流向南汇入一湖或湿地),这与图尔盖的情形相符。但《雍正十排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的“Gücin Gurban Torohoi”(古沁古尔班托罗辉)之地被标于一狭小地域。在《乾隆十三排图》绘制之前,达尔党阿、哈达哈等将领所率清军进入过哈萨克北部,努三等人的使团也抵达过阿布赉汗廷。期间应该搜集有更直接且详细的地理情报。^①但奇怪的是,《乾隆十三排图》在哈萨克北部的记述上并未超出《雍正十排图》多少。

上述事实说明,《雍正十排图》中有关哈萨克的记述对《乾隆十三排图》相关内容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二者在这方面的传承关系值得研究者重视。

当然,《乾隆十三排图》有关哈萨克北部的记述中也并不乏新内容。但是,相异于《雍正十排图》内容的一些新地名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疑惑。比如,在上述古沁古尔班托罗辉以北和西北出现了“阿玛尔吉哈萨克”和“北哈萨克”两个地名。其实,这两个地名含义是相同的(“阿玛尔吉”乃来自满语 amargi,意为“北”)。为何在相互邻近的地区出现了含义完全相同的两个地名?是《乾隆十三排图》编绘者有所不察还是另有原因?我们发现,上述两“北哈萨克”东面还出现了“阿布赉哈萨克”地名,由这一事实出发,我们推测《乾隆十三排图》作者这里是想反映北部哈萨克部众当时分属不同首领的情形。近年发布的清代满文档案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为我们的这一想法提供了佐证。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形成于乾隆二十三年11月的题为《[军机处]查奏哈萨克源流片》的一份奏折^②中提到:乾隆二十二年哈萨克首次遣使时,清廷依据阿布赉使臣杭集噶尔提供的信息制作了一份哈萨克地图。一年以后,位于塔什干周围的哈萨克首领托列拜也遣子卓兰出使清廷。到北京后,清吏向卓兰出示了一年前绘制的地图,以期确认先前得到的有关哈萨克北部的地理信息。而作为来自哈萨克南部的人,卓兰也只能大略地肯定杭集噶尔所说。需要指出的是:卓兰在回答清吏的问题时,特意提及北方哈萨克中玉兹的三个地位相当的统治者:其一为阿布勒班必特子阿布勒比斯苏丹,其二为似亦拥有“汗”号的汗巴巴苏丹,其三便是一年前首先与清朝建立关系的阿布赉。^③《乾隆十三排图》中呈现的哈萨克北部的上述地名内容或与杭集噶尔和卓兰提供的这些信息直接有关。

① 努三出使返回后,的确写有关于哈萨克地域的奏折。关于此奏折的研究,见下列诸文:Noda J., *The Kazakh Khanates between the Russian and Qing Empires: Central Eur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uring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Leiden/Boston: Brill, 2016, pp. 157-158 (该书2011年日文原版,第129页); Onuma Takahiro, *Shin to Chūō Ajia sōgen: Yūbokumin no sekai kara teikoku no henkyō e* 清と中央アジア草原: 遊牧民の世界から帝国の辺境へ, Tokyo: Tokyo daigaku shuppankai, 2014, pp. 194-195; Ezhnkhani-uli B., “Two Manchu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Kazakh Ge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18th Century,” paper submitted to “Beyond Empire and Border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Qing Dynasty and Inner Asia” hel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from October 5 through October 8, 2017.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录副档,档号1726-044。该档收入邢永福主编,邹爱莲、巴哈提·依加汉副主编:《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第一册),第180-182页。其哈萨克文翻译见:巴哈提·依加汉主编:《哈萨克汗国与清朝的政治—外交关系》(哈萨克文),阿拉木图,2009年,第120-124页。

③ 巴哈提·依加汉主编:《哈萨克汗国与清朝的政治—外交关系》(哈萨克文),第123页。

《乾隆十三排图》中类似的问题仍有许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具体史料。期望满文档案文献及清代地图的进一步发布和研究能为有关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帮助。

五、两份纪行中所反映的哈萨克和准噶尔势力的消长

除了上述图里琛《异域录》外，十八世纪上半叶涉及哈萨克的清人纪行还有几篇。尽管这些纪行中的相关记述往往比较简略，但其中的一些内容就某些具体的史实而言仍具有其独特的史料价值。佚名作者的《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及方观承的《从军杂记》即为我们提供了与1727年至1732年期间哈萨克和准噶尔势力此消彼长的形势以及二者游牧地界变动有关的珍贵信息。

《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长期以来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吴丰培先生把它从《肃州新志》检出并把它纳入《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①一书中后，此纪行方进入更多研究者的视野。纪行中的如下记述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自乌鲁木齐而西五百余里为秧巴尔哈损，古亦名阳关。^②蒙古以城关为巴尔哈损。再五百余里为塔尔奇山，下临伊里河，为准噶尔驱牲之所。又云准噶尔之西界以吹、塔喇思为限，吹河在北，塔喇思河在南，布鲁特、哈萨克咸在两河之西。^③

上述记述中较明确地指出了准噶尔在西面与布鲁特、哈萨克以吹(即楚河)、塔喇思(即塔拉斯)为界的事实。那么，这一史料反映的是何时的情况呢？纪行主要内容中虽见有具体的日月记载，纪行中给出的最早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最晚日期是“一月(当为来年一月)二十八日”，但原作者并未指明此日月属何年。与纪行史源及时间问题相关，吴丰培先生曾经提出：《肃州新志》中所见该纪行与王树枏等人所编《新疆图志》中的《使准噶尔行程记》应为同一史料；此纪行的形成与雍正十二年傅鼐、阿克敦出使噶尔丹策零有关。^④依照吴先生此说，该纪行中所称“准噶尔西与布鲁特哈萨克以吹塔喇思为界”的情形应属雍正十二年亦即1734年。然如下事实与吴先生有关此纪行形成时间的推论相左：首先，据《清实录》雍正九年六月丙午的一条记载可知，1730-1731年间哈萨克与准噶尔的交界之处已移至“阿里马图西拉百尔”；^⑤其次，

^① 吴丰培校编：《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第35-46页。

^② 作者此处把转写别族语用字“秧”与“阳关”之“阳”作比附，自然不可相信。此“秧”或可来自突厥语“yaqa”(意为“新”)。

^③ 吴丰培校编：《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第42页。

^④ 吴丰培校编：《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第45页。

^⑤ 《清世祖实录》卷107，雍正九年六月丙午，第14-16页。其文称：“噶尔丹策零……又派兵一万，令诺颜和硕齐总领，驻防阿里马图西拉百尔地方。噶尔丹策零处兵丁不过二万名保守。又供，噶尔丹策零前令其妹夫罗布藏策零带兵一万名，往阿里马图西拉百尔驻扎，防守哈萨克国。”此处所称阿里马图即今阿拉木图。而据我们的研究，此处所称“西拉百尔”与乾隆时期史料中出现的“沙喇博勒”(满文档案中写作“Sarabel”，当来自哈萨克语“Saribel”(“黄色山脊”)为同一处，是位于阿拉木图西南方向的山地；其大致方位为：东至现库尔图(哈萨克语“Күрті”)河源；南抵现可可里克(哈萨克语“Кеклік”)山和苏额克托别(哈萨克语“Суық төбе”)山；北到现卡斯铁克(哈萨克语“Қастек”)达坂(有关研究参见：B. Ezhnhan-uli, “Two Manchu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Kazakh Ge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18th Century,” paper submitted to “Beyond Empire and Border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Qing Dynasty and Inner Asia” held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 from October 5 through October 8, 2017.)

从方观承的《从军杂记》中也可以看出：准噶尔与哈萨克在雍正十年(1732)是以伊犁河流域(应是伊犁河西段及其南边山地)为界的(见下文)。那么，关于《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成于雍正十二年的推断是否正确？或者说，这一史料中有关哈萨克的上述记载反映的是什么时候的情形呢？

其实，把该纪行与傅鼐、阿克敦的出使作联系本身是有问题的。如上所述，《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中给出的最早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三日”，最晚日期是“一月(当为来年一月)二十八日”，这与傅鼐、阿克敦出使的月份不符(傅鼐、阿克敦出使是在雍正十二年八月^①)；与此相关，纪行中还有两处内容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细查标明日月的“行程”记内容部分，这里提到的准噶尔首领并非噶尔丹策零，而是策妄阿拉布坦；第二，在标明日月的“行程”记内容之后，从《肃州新志》中检出的这一纪行中很突兀地出现了一段与前文形式完全不同的、标有《准噶尔》题目的一段文字。在这段文字中，提到了策妄阿拉布坦的死亡、噶尔丹策零的继位以及傅鼐、阿克敦的出使(这应是促使吴丰培先生做出上述推断的主要原因)。不过，这一风格迥然不同于前文的段落有一大部分内容依然是在谈策妄阿拉布坦的性格喜好以及他如何在其汗帐中与众宰桑及喇嘛共商正事；此后涉及噶尔丹策零的219字也并没多少与噶尔丹策零直接相关的具体史实。这一切都说明：以《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之名传至今日的这一纪行在其形成过程中内容是有过变化的；其原有基本内容应包括标明日月的“行程”记和题为《准噶尔》之段落的前面部分；本来与傅鼐、阿克敦之行并无直接关系的这一部分内容应是某次更早时候出使策妄阿拉布坦的清人所留下的记录(或是清人利用来自准噶尔的情报编纂而成，亦未可知)，但在其流传过程中，有后人把关于噶尔丹策零的219字内容加入了其中。

策妄阿拉布坦死于1727年。也就是说，《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中所涉及的有关哈萨克与准噶尔游牧地界的内容最晚应属1727年。

与《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比较起来，《从军杂记》的形成时间要明确得多：雍正十年，作者方观承随定边大将军福彭征讨准噶尔，此纪行即为其从军之作，成书时间为雍正十一年。该纪行原来只见于《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二帙，后来被吴丰培先生编入《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一书中。^② 纪行中有如下三处涉及哈萨克的记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哈萨克在准噶尔之北，与布鲁特连界。即古大宛国。其人悍鸷，善火枪，来去倏忽。准夷畏之。

准酋阻伊里河而居……大宛渥洼水在准夷北界。

哈萨克亦回属也。由兀良海可通。彼^③北困强邻，西南尽失。其外蔽则伊犁所持之险，如他犁奇等岭，亦无所用之，当坐见困敝矣。^④

方观承有关哈萨克的认识显然受到源自康熙皇帝的“哈萨克即古大宛”这一历史比附的影响，因而此处所谓“大宛渥洼水”的记述实际上无甚意义。不过，其对哈萨克的其他描述当不是空谷来风。这里所说的“准酋阻伊里河而居”，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它与上述《清实录》雍正九年六月丙午条中所记“噶尔丹策零前令其妹夫罗布藏策零带兵一万名，往阿里马图西拉百尔驻扎，防守哈萨克国”的情形是基本相符的；而近年公布的满文档案中也见有类似的记载：据雍正

① 《清世祖实录》卷146，页1下—5上，雍正十二年八月丙午。

② 吴丰培校编：《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第67-87页。

③ 由前后文义可知，此处“彼”所指乃是准噶尔而非哈萨克。

④ 吴丰培校编：《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丝绸之路资料汇钞(清代部分·上)》，第84、85页。

十一年四月十六日(1733年5月29日)形成的一份文档,哈萨克人于此之前的冬天曾越过巴尔喀什湖冰面以及经由伊犁河西面巴哈纳思之地去进攻准噶尔。^①结合这几项史料,我们相信:方观承的“阻伊犁河而居”乃是一笼统说法;实际上,1730-1733年间准噶尔是在伊犁河至伊犁河西南西拉百尔一线防范哈萨克的。

上述游牧地界的变化当与“昂额拉亥战役”有直接的关系。1729年(或1730年),因准噶尔的攻击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哈萨克三玉兹联合协作,在昂额拉亥山地(位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楚河县境内,距上述“西拉百尔”之地不远)对准噶尔汗国发动了攻击并取得了重大胜利。因这一战役对哈萨克历史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故无论在哈萨克传统口述历史中还是在当代史学研究中它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②我们认为,“昂额拉亥战役”的影响在我们讨论的清代纪行史料中也得到了反映:《哈密至准噶尔路程记》中讲“准噶尔之西界以吹、塔喇思为限”,其所反映的是该战役发生之前的情形,而《从军杂记》中说到的准噶尔“阻伊犁河而居”的事实应来自“昂额拉亥战役”之后的变化。当然,哈萨克与准噶尔势力此消彼长的形势在此后也有重复。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册,第31-37页。

^② 有关的历史及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现仅举其中二例:(1)五卷本《哈萨克斯坦史》哈萨克文版,第3卷,第243-149、143-149页;(2)《昂额拉亥战役》词条(俄文),《哈萨克百科全书》编委会编:《哈萨克斯坦国家百科全书》,阿拉木图:《哈萨克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